

广东工商史料辑录 6

综合

民建广东省委
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 编

目 录

广州古代经济发展概貌 ^s	梁国光(1)
古代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梁 山(4)
唐以前广州与海外贸易试探	余思伟(8)
明代广州的海外丝绸贸易	徐俊鸣 郭培忠(12)
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	黄启臣 邓开颂(18)
简析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的经济发展	吴志辉(23)
解放前的汕头海关	王琳乾(27)
张之洞的币制改革	肖茂盛(48)
民国初期的“一国多币”见闻	资耀华(52)
潮汕解放区银行的建立和沿革 揭阳县《金融志》编写组(56)	
广州解放前的保险业	陈华新(58)
潮州商业与清末商会	翁兆荣(60)
抗战前后的雷城工商业	蔡声扬(61)
梅县商会积极参加“5. 12”武装起义 廖汉泉 欧队英(63)	
肇庆商会是第一个合法团体	翟辉怡(64)
华侨对兴办祖国铁路的贡献	李松庵(65)
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朱文炜 汤肯堂(71)	
简氏兄弟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张 高(75)
赤诚报国话当年——访民建早期会员 陈祖沛同志	丁 梁(79)
大成行的回顾	丁 梁(81)
重视信息、技术和科技人才 ——大成行纪事之二	陈乃良 马远文(84)
港币的发展史	《广角镜》资料室(86)
香港的十大财团	《华人月刊》资料室(92)
香港百货业的竞争	嵇 之(93)
澳门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澳门) 文 星(96)
从练习生到亿万富翁	黄学礼 卫国强(98)
香港金融奇才冯景禧	余思伟 邓开颂(101)

工商业家王宽诚	《广东工商》(1 0 3)
爱国实业家——李嘉诚	李春泽(1 0 4)
曾宪梓与“金银利来”	《广东工商》(1 0 7)
霍英东和“白天鹅”	方远生(1 0 9)
漫谈十三行	卢瑞章(1 1 0)
高第街的沧桑	璞 原(1 1 1)
中国火柴业的先行者	麦 穗(1 1 3)
梁苏记雨伞小考	璞 原(1 1 4)
潮安“三星”电池厂创业史	杨庭松 许振星(1 1 4)
李占记	璞 原(1 1 7)
阳光·活力·百年老店 ——记体育用品商店新以泰	麦 穗(1 1 8)
黄金海与三多轩	麦 穗(1 1 9)
端 砚	翁兆荣(1 2 0)
经营有方的广州英记茶庄	陈子邦(1 2 1)
酱园的“长老”——致美斋	麦国良(1 2 3)
中山咀香园杏仁饼	中山咀香园、工商联(1 2 4)
佛山盲公饼	程进文(1 2 5)
广州莲香楼和莲蓉月饼	《两会粤讯》(1 2 6)
广式月饼多姿多采	程进文(1 2 7)
娥姐粉果	夏 炽 李珊(1 2 7)
蛇王满由来	吴楫川(1 2 8)
蛇 餐	建 平(1 2 9)
粤菜的四大分支	马远文(1 3 0)
饶有特色的珠江三角洲小食	马远文(1 3 1)
潮州市竹类业今昔	郑启昭(1 3 2)
惠州土特产——梅菜	廖罗林 惠 谋(1 3 4)
驰名中外的北江土特产	杨兆祥 江作良(1 3 5)
谭礼庭	何崇校(1 3 6)
梁墨缘	伍 锦 张鸣皋(1 4 0)
马玉山	王兆裕(1 4 6)
维他奶大王罗桂祥	梁 通(1 5 0)
盘谷银行总裁陈有汉	陈楚松 江白潮(1 5 4)
附：补正《潮安县商会沿革记》历届商会会长、 助办(秘书)名单表(辑录<1>)	(1 5 5)

广州古代经济发展概貌

梁 国 光

一、古老的城市

广州是我国南方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早在四千多年前，广州的先民已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他们以石制工具，从事原始的锄耕农业和渔猎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广州地区的以“双肩石器”为特征的原始文化。

广州最早的名字，叫做“楚庭”。据史书的记载，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传说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个仙人，身穿五色衣，骑五色羊，手里拿着一茎六出的稻穗，来到楚庭。仙人把稻穗赠给这里的人民，并祝愿从此“永无荒饥”，随即腾空飞去，留下的五只羊则化为石。①所以，广州又被称为“穗城”和“羊城”。其后，在此地又筑有“南武城”。②当时广州的社会经济活动，仍是处于以物易物或实物货币的状态。③

二、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广州逐渐成为南方的都会和对外贸易的港市

秦汉时期是广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地区，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的郡治就设在广州（当时称番禺），秦始皇平定岭南地区时，迁徙内地五十万军民南下，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

术，与当地越人共同开发岭南，促进了民族的融洽和社会的发展。从此，广州开始发展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秦末，南海郡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208年）在番禺建都城，“周迥十里”后人称之为赵佗城（其遗址在今中山四路的旧仓巷至登峰路一带）。这是在广州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小王国。西汉王朝建立后，赵佗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号，“比内诸侯”，并仿汉廷官制。赵佗死后，传位至五世，越相吕嘉叛乱。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年）派兵平定，从而结束了南越国在广州的割据局面。广州仍为南海郡的治所。

秦汉的大统一，促进了广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在城市建设上，已出现具有南方特色的干栏结构的房屋，有平房，也有楼阁，还有由几座房屋组合起来的建筑群。在农业生产上，已应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并注意农田灌溉。品种除水稻、高粱、小米等粮食作物外，还有梅、李、橄榄、酸枣和花椒等经济作物。鸡、鸭、鹅和猪、牛、羊等禽畜的饲养，亦已有相当发展。二千多年前的广州，已初步成为一个鱼米瓜果之乡。

在手工业方面，印纹陶器的生产最普遍，烧窑温度已高达1,100摄氏度。有些陶器还涂上一层透明的玻璃釉，形成南方青釉陶器的特色。其他如铜器、玉器和彩绘漆器等亦有较高的成就。最重要的则是造船技术已达较先进水平，能制造载重几十吨的大木

船。④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促进下，广州的对外贸易亦随着发展起来。西汉司马迁著的《史记》，说番禺（广州）是一个“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城市。中国的船队，经广州远航到南洋各地，其后航线更远达波斯湾，与东罗马帝国（大秦）也有商业往来。当时的广州，不但是我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市。

三、三国至南朝时期（220—580年）广州始建州治，海外往来逐渐频繁

三国时（220—265年），广州地区属孙吴政权管辖。黄武五年（226年），吴把交州分为交、广二州，将合浦以北的地区划归广州，其南仍为交州。广州州治番禺。广州的命名由这个时期开始，距今已有1,700多年。

两晋南北朝时期（265—589年），北方长期处于混战局面，南方则相对稳定，中原人又一次大量移居广州。南北人民的融合，互相交流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广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晋时曾“大开鼓铸”，制造各种铁器，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铁业。⑤在纺织上，已采用木棉花作原料织布，⑥南朝刘宋时，还生产出“薄如蝉翅”的葛布，一幅八丈长的布卷起来可装入竹筒内，被誉为“入筒细布”。在制陶业上，已进入了半陶半瓷阶段，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釉器大量生产，釉色已有彩点出现。

这一时期，海上交通亦很活跃，广州已逐渐发展为“外国贾人以通货易”的重要口岸，中外使者互相往来，海外僧人接踵而至。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在广州兴建了王园寺（今光孝寺）。南朝萧梁普通七年（526年），西天

竺（今印度）僧人达摩在广州兴建了华林寺。它们都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留下的名胜。

四、隋唐时期（581—971年）广州成为世界知名的大港市

隋唐的统一，广州迎来了封建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唐代，广州一直是岭南道（后为岭南东道）的治所。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使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广州商业日益繁荣，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由广州出发的海舶远航于东南亚和波斯湾沿岸诸国。中国陶瓷的烧制技术也在这时传至东南亚一带。当时的广州，成了外国与中国通商所必达的港口，所以有些外国人就把广州叫做中国。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一个大港市。

为了适应广州通商发展需要，开元二年（714年）唐朝政府开始在广州设管理外贸事务的“市舶使”并建“蕃坊”（遗址在今光塔路一带）专门让往来的外国人居留。当时侨居广州的外商，最盛时达十万人以上。外商中以阿拉伯人居多，现存的著名古迹怀圣寺和光塔，就是当时由阿拉伯人捐资兴建的。

五代时，刘𣐬趁中原王朝分裂破碎之时据广州建南汉国，改广州为兴王府。这是在广州建立的第二个封建割据的小王国。为了促进国内的货币流通，南汉主曾大量铸造铅钱，名为“乾亨重宝”。以铅铸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并不多见，在广州则更是唯一的一次。⑦

五、宋元时期（960—1368年）广州城市建设大发展，港市更加繁荣

宋元时期，广州的海上航线已远达非洲东部和北部。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都比

以前大为提高。所造的海船,结构坚固,每艘可乘五、六百人。船上设备齐全,并最早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上,⑧以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由于中外商船来往频繁,海外大量的香药珍宝之货,经广州输往中国内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亦经广州输往非洲和欧洲等地。广州,成了当时中国海运的要冲。为了适应外贸的需要,广州的民间制瓷业亦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窑场——西村窑,仿烧国内一些名窑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目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洋一带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均有西村窑瓷器的发现。

开宝四年(971年),北宋政府在唐代设市舶使的基础上,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制度,为以后明、清朝沿袭,实是海关的前身。

宋代广州的城建,进入了大规模扩建的时期。从北宋景祐三年(1037年)至南宋景定元年(1206年),广州城共经过十多次规模不等的修建和扩建。城市面积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具有东、中、西三城并峙的规模。东城和子城是熙宁元年以烧砖砌筑而成的,是广州最早的砖城。西城是为保护外商而扩建的,规模最大,那里是繁荣的商业区和外国人聚居的地方。为了解决“海潮秋咸”时居民饮用水的需要,当时城人用竹管接引白云山的泉水入城,南宋时改竹管为石槽,称为“石水笕”。著名的下水系统——六脉渠,也是在这时期修成的,至今仍是一项重要的排水设施。

六、明清时期(1368——1840年)
广州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对外贸易继续繁荣

明清两代,广州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很

快。当时的冶铁业已很有名,有“铁莫良于广铁”之誉,铁制产品远销中外;纺织业亦很发达,所产纱、绸、缎等是出口的重要商品;彩瓷亦享有盛名;其他如竹、木、象牙、玉石等各种雕刻工艺品异彩纷呈,驰誉遐迩。自明中叶(十六世纪)至清初,在冶铁、制陶、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中,已出现一些规模较大、产品专业化的手工业工场;在一些行业中出现了手工业工人(西家)与业主(东家)共同协商议价的情况。这些变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州城垣在不断扩展。从明初“合三城为一”到清代增筑鸡翼城,城区日益扩大;六脉渠更趋完善,成为沟通全城的下水管网;镇海楼等宏伟的高层建筑亦在此时建成;新的街道相继出现。城西商业区较前更为繁荣。这时,广州在城市建设上已具有大都市的规模。

对外贸易更是日益繁荣。在明清政府先后实行“海禁”期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政府在这里专设“怀远驿”以接待外商外使,康熙24年(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专设“粤海关”,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著名的“十三行”(亦称“洋行”),是政府特许承包与外商进行一切贸易事项的商行,也是在这一期间发展起来的。

注释

①关于五仙五羊传说的年代,众说纷纭。此处采最早之说,见《寰宇记·五羊城》条及《广东新语·石语》。

②关于公师隅在周赧王时筑南武城一说不确。因周赧王在位为公元前314—前256年,已在公元前355年时,楚已灭越,何来越相?故这里不具体说出年代。

③据考古发现,广东的秦或汉初的墓葬,除了

古代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梁 山

在历史上，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不仅是比较早的，而且开始的时候发展也是比较快的。秦始皇平定南粤后，于公元前214年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粤武王，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粤王国，其王都就设在番禺，也就是后来的广州。

由于赵佗成功地推广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加上汉与南粤通关市，始行互市贸易，不到100年，就把一个原来十分落后的番禺，发展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都会，使广州（番禺）很快便初步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今对这个历史过程，试作若干探讨。

一、秦平定南粤后，岭南经济出现了新的局面

岭南地区在战国时代，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那时与中国内地已有经济联系。战国的荀卿说过：“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之；南海有羽、鬃、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①来由越南和越南各部落林一含词义里既，西家个左族自原在越南，人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50万，为5军……”，^②大举开进南粤，但兵多势大，“监禄无以转饷”。^③于是，他便使监禄开凿灵渠，建成兴安运河。使从今湖南省的湘江，可经灵渠入漓水、桂江，直抵番禺（广州）城下。灵渠，是历史上开发岭南的第一个重要战略措施，也是2,100年前的一项工程奇迹。到汉代，番禺已可经过灵渠在水路上与京师长安相通。^④秦平定南粤以后，于公元前214年置三郡（南海、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13年“以谪徙民50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⑤从此，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便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二、南粤王国的政治安定局面，是当时广州经济发展的前提

公元前210年，始皇死，中原随即大乱。那时的南海尉任嚣，向龙川令赵佗授计：“秦为无道，天下苦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⑥这一番话，把天时（时势）、地利、人和等等都讲透了。

赵佗遵照任嚣的意见，组织几十万戍卒，“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⑦

赵佗把中原地区来的人和当时文化还很落后的南粤人和睦相处，当作是巩固南粤王国的首要问题。这个工作是做得颇有成效的，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第一次派陆贾出使南粤，正式

立赵佗为南粤王时的诏书是这样说的：“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以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⑩ 这封诏书，描绘了当时南粤王国一派政治安定的局面。这正是番禺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三、“汉与南粤通关市”和“南粤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内地来的戍卒 50 万人，与越杂处。赵佗还请求拨无夫家女子 3 万人，结果准再南徙 15,000 人。^⑪ 他们既是一股很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更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由于秦所发戍卒，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第八册，2284 页）而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注则谓：“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所以，秦所发的戍卒，首先就有不少商人，其次是从事农牧业、手工业致富的人。这些人大多是颇有经验而又颇有致富能力的人。他们来到南粤后，是不会甘心随俗守贫，更不会甘心于随着落后的部落，浑浑噩噩过日子的。所以，可以这样说，这是一股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技术和推动南粤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终于又迎来了“汉与南粤通关市”，开展互市贸易。这是对古代广州地区经济开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许多先进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可以经过“通关市”被引进到南粤地区来。特别是金铁田器的推广使用，即使在汉初的中原地区，也是极端重要的。正如公元前 81 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所指出的：“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田野辟而五谷熟。……器用不便，则农夫罢（疲）于野而草莱不辟……，则民困乏”。^⑫ 可见在当时，铁器竟是农夫的生命。此外，手工业、军事装备，也绝少不了金铁。所以金铁田器的源源输入南粤，这对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南粤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促进作用，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根据考古的发现，铁器在南粤王国时已得到较广泛的使用。解放后，广州发掘的 182 座西汉前期墓葬，其中有 51 座墓有铁器或其残迹。出土铁器有 156 个号件。其中兵器（铁铤、铜铁除外）及生产工具 39 件。南粤亡后三百年间的出土铁器反而少得多（发掘 227 座墓，出土只 12 件）。^⑬ 这就足以证明，南粤对先进工具的重视，互市贸易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互市贸易与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使当时的广州在经济上取得明显的成果。如在汉平南粤时，路博德进兵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贡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户口簿迎降。^⑭ 而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出土陶塑的牛、羊、鸡、鸭、鹅、猪等亦常见。这些出土的陶塑牲畜，加上其他许多出土的粮食作物和各种果品等，还有储藏粮食的仓、囤模型等，汇成一幅汉代广州农牧业生产的兴旺景象。这就为古代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打下物质生产基础。

四、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南粤王国，地方安定，经济发展，而促使广州在南粤王国时初步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还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海外贸易与海外交通的发展；一个是“汉与南粤通关市”，盛行与内地互市

贸易。那时，番禺成为一个商业都会，四面八方货物集散之地，交通运输，就成为头等重要之事。

古代广州地区与南亚各国的民间海上贸易往来，当在汉武帝之前就已有了。但这在典籍上却难找根据。现在直接从实物找根据，却已有了不少眉目。例如，广州西汉前期（下限公元前111年）的汉墓出土已有犀角模型，还有漆扁壶上面绘有犀牛图，^④而犀牛的产地原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⑤

至于官方的海外来往，按《梁书·海南诸国传》的记载则是“自汉武帝平南粤后，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皆朝贡。”汉武帝还公开招募敢于探险、远赴海外的人员由译长率领入海，带着黄金、丝织品前往，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远海中则有蛮夷贾船转送，如果途中不被人劫杀或风波溺死，则数年可回来。

《汉书·地理志》那段史料还可说明，这一切都不可能是公元前111年之后才从零做起的。第一，汉朝的兵威未到日南郡时，其徼外各国也必早知道有南粤王国，打过交道，有过商业来往，汉文帝曾劝赵佗“存问邻国”，这些邻国，也当属于存问之列。当他们感到汉朝兵威强大，已灭南粤，便要作朝贡的打算了。第二，武帝派译长，带黄金、丝织物入海，这条海路也绝不会是从零开始，必定是南粤王国就已有不少人去闯过的。而且汉武帝到哪里去招募熟悉远赴海外的人员？当然以在原来的南粤王国地区招募为最现实可靠。故早在汉武帝之前，南粤王国已有海外交往活动，并且成为以后汉武帝进一步加强海外活动的基础，这是比较可信的。

《汉书·地理志》所说：“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这些商贾来番禺做买卖，发财致富，那时番禺的货物，主要是有犀、象、珠玑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海外运来的东西。这就说明当时番禺已经是一个海外贸易的港市。

如广州西汉中期汉墓出土的“托灯陶俑”，形象不同于一般的陶俑，据考证这是印度尼西亚或亚洲西部或非洲东岸的人被贩至广州为奴隶的反映。这种陶俑延至西汉后期的墓葬还续有增多；^⑥汉代的文物，也有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出土，如五铢钱、陶器等。其中在苏门答腊出土一件陶鼎，底部有元帝初元4年（公元前45年）的纪年铭文。^⑦以上各点都证明古代的番禺（广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港口城市，确是较早地形成了。

广州在古代与内陆腹地的交通与贸易，也是广州之所以较早地形成经济中心的一个重要条件。秦汉时代对岭南地区的水路交通，一方面有天然河道，一方面靠监禄凿通的灵渠。那时“此渠一通，可由番禺直达长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⑧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端，西、北、东三江交汇于此，这三江构成一扇形河网。东、北两江的干流各长约1000里，西江则更加远溯广西、云南、贵州，干流长达4000多里。南粤王国时，沿西江的苍梧，贵县等都是重要都邑。西江在广西地区，支流甚多，又可经灵渠出湘江、长江。古代的西江、北江都经过石门，河面甚为开阔，直达番禺城下。

西汉时期，第一个与粤中原王朝通关市的是南粤王国。特别是当时的王都番禺，与汉早已开展互市贸易，使其首先成为一个南方商业都会。这就是利用了交通的便利条件。当时法网疏阔，商人泛舟行船周流天下，通其有无。汉武帝时，唐蒙出使南粤，吃到四川的蜀蓂。可见四川与南粤早就通过牂牁江有贸易往来。那时的牂牁江可以行船，直抵番禺城下。汉初，临邛（四川）程郑以炼铁致富。其铁就是卖给南粤。^⑨铁是最笨重的，其运输路线，必定也是利用那早已畅通的“蜀蓂之路”（牂牁江）。

当时从番禺运去北方的珍货，是越来越多的。从一些史料看，这方面的贸易，确是相当繁荣，

“富人簪玕珎，垂珠玕”。“饰文采，丛珍怪。”这是汉武帝时的情景；^⑨“豪人之室……船车贾贩，周于四方”。“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这是东汉仲长统（公元180~220年）在《昌言》上提到的。^⑩

汉代四川的手工业已经很发达。《盐铁论》称中国运蜀郡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玕犀象等珍品。《盐铁论》还说“汉武平南粤，而民间厌橘柚”。^⑪这也可见当时与内地贸易一斑。

海内外贸易和交通的发达，又促进了当时广州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从当时的造船业、铸铜业和陶器业等手工业情况，即可窥见到当时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广州汉墓出土有航船模12件。这“无疑是当时这地区造船业与船运交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反映”。^⑫真正的木船，应比陶船模还早，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就在南粤王国的时候，或稍后，绝不会晚于公元一世纪，广州就确实有了颇为先进的造船业。西汉前期的广州汉墓出土铜器颇多，在182座之中有90座是有铜器的。南粤王国曾在合浦郡铜山开采铜矿。《汉书》说，番禺这个都会是“银、铜、果、布之凑”，说明当时广州及其周围地区都有相当水平的铸铜工业。陶器在西汉前期（下限：公元前111年）的汉墓出土也很多，占这期出土器物的72%，共3,490件。可见当时已有较大的陶器业。这也必定是赵佗推广北方先进文化的一项优先项目。从当时广州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来看，在南粤王国时，广州经济中心已初步形成。

五、小 结

广州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已是2,000年前的事了。但是回首往事，也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教益：

- (1)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残破；南粤却很快有一个政治安定局面，这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当时的南粤不失时机地努力推广先进文化与先进技术，其收效也是显著的；
- (2) 由于番禺与海外渐多贸易往来，经济日益有所发展，从而奠定了繁荣的物质基础。于是便迎来了“汉初与南粤通关市”，开展互市贸易的新局面。当时的广州（番禺），在南粤王国时）也因此很快初步形成为中国南方以贸易通商为特点的经济中心，成为南方一个重要的都会和港口城市。

注释：

- ① 《荀子·王制篇》。
- ②③ 《淮南子·人间训》。
- ④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36页。
-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⑥⑦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 ⑧ 《汉书·高帝纪》第一册73页。
- ⑨ 《史记·淮南王列传》。
- ⑩ 《盐铁论·禁耕第五》。
- ⑪ 《广州汉墓》159页，484页。
- ⑫ 《水经注·叶榆河》。
- ⑬⑭ 《广州汉墓》476页。
- ⑮ 《广州汉墓》477页，478页。
- ⑯ 《广州汉墓》479页。
- ⑰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36页。
- ⑱ 《史记·货殖列传》（卷129）。
- ⑲ 《汉书·东方朔传》（卷65）。
- ⑳ 《后汉书·仲长统传》（卷49）。
- ㉑ 《盐铁论·未通 第十五》。
- ㉒ 《广州汉墓》475页。

唐代，广州曾作为我国海外贸易的中心而闻名于世。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高度发达并非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唐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对外通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对于唐以前广州与海外通商的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就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唐、宋时期广州会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贸易都市。

有关唐以前广州与海外贸易的资料较零碎贫乏，现将所能蒐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分成四个历史时期，并试析其特点。

一、秦汉时期番禺开我国与海外交通之先河

地际南海的番禺（广州），早在秦汉之时，就成为我国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秦一统后，置南海郡，番禺为郡治，从此，番禺逐渐成为输入海外物产的口岸。秦末，南海尉赵佗乘机称王，成立南越国，广州是其王城，交广皆为其所辖。这时，广州城区迅速扩展，并成了中外商人聚首之处，“粤地，……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一说“果布”是龙脑香）之族，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①赵佗很注重番禺海外贸易的发展，梯山航海远及波斯（伊朗），影响颇为深远。

番禺海外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当地造船业的发达。秦汉时期，广州的造船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广州已发现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在试掘的400平方米范围内，有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场，在这里可建造宽约七、八米，长约三十米，载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这种船已能航海。广州汉墓出土的明器（即楼船），也证实了当时船舶构造水平已相当高。

当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对外贸易中虽然占着主导地位，但从海路获得异国奇珍也已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西汉政府特遣官员出访南海各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②这是有关官营贸易的最早记载。因我国商人在汉使出访之前早和蕃商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故汉使“所至国皆察食为耦，蛮夷买船转送致之。”^③这时，一条从番禺启航，沿着海岸线通往印度洋的航线已基本形成。

南洋与我国毗邻，是最早与番禺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公元一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扶南帝国，它的俄厄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中西海船往返必经之地，俄厄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个东汉时期的青铜镜，一个铅质的装饰金属板和两个中国制的小佛像。^④我国古籍记载，东南亚国家较早取海道前来通商的是叶调国（位于爪哇岛），在“永建六年（131年），日南（今越南中部）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⑤东南亚输入我国的主要物产是瑇瑁、象牙、犀角和各种香料；我国从番禺输往东南亚的主要物品是青铜器、陶器和黄缯等。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现有我国的青铜斧。加里曼丹岛的沙捞越河口发现了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112年我国古代的钱币（即五铢铜钱）。苏门答腊发现的一个碗上绘有穿着我国汉代服式的人物和马的图案。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出土的瓶，都是汉代款式，据鉴定，其雕线及凸雕图饰的长石釉（胎）陶尊，属后汉华南和浙江地区出产的类型。加里曼丹出土的一件印圆纹陶甗，也与广州出土的西汉后

期至东汉前期的同类器皿外形酷似。在苏门答腊发现的陶器中有一个灰陶三脚鼎，底部刻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纪年。燃薰各种香料用的薰炉是广州汉墓最常见的随葬品，这些香料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以上考古的发现，证实了这个时期我国和东南亚密切的贸易关系。

至汉代，我国与南亚及其以西各国的海路交通渐趋发达，据《后汉书》所载，天竺国“西与大秦（东罗马）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氍毹、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89—105年），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①这段记载表明，天竺乃是大秦等地物产的贸易中转站。原来，天竺与中国通商是取道于陆路，后因通西域的丝绸之路阻塞，在二世纪中叶改取海道从日南徼外频繁来华访问、交易。稍后，远隔重洋的大秦等国也直接派船抵中国。本来“（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西亚古国，原波斯一行省）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②当时中国的丝绸大部分通过安息商人转贩大秦，安息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以海路险恶、远不可及为由，阻拦大秦商人直接取道来中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③汉桓帝统治时，“博晓经藏”的安息国太子，“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从汉桓之初，始到中夏”，④并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带来的货物多数是珠宝、琉璃之属。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很多由玛瑙、鸡血、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玻璃等不同材料造的串珠，其中的玻璃珠，与西方古代的玻璃相仿，⑤此类舶来品，可能产自大秦。

，综上所述，广州由于它特有的地缘关系（近临海洋，港湾优良），又是华南的经济中心（以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为腹地）因而最早成为我国与海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南越国灭后，日南郡治西卷港（位于今越南中部顺化附近）和交趾郡治龙编港崛起，这才结束了广州单独垄断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局面。至汉桓帝时期（147—165年），取海道与中国贸易的国家明显增加，广州港又重新有较大的发展。

二、孙吴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

三国鼎立时期，孙吴政权治理江南，注重经济开发，使这个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和造船业，都有较大的发展。这时已能造长达二十余丈的大商船。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往夷洲（台湾）的大型舰队，装载将士达一万多人，能横渡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可见航海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黄武五年（226年），孙吴将交广分开，正式命名“广州”，广州地区的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获得宫廷所需的异宝和扩大财政收入，孙吴很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当初吕岱从广州发兵往交趾时，取海道，“督兵三千人昼夜浮海”。①吕岱任交广刺史（226—231年任此职）后，为了促进交广的商业发展，特派遣地方使节出访以印度支那为重点的南洋诸国。《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说：“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名诸王，各遣使奉贡。”扶南国王范旃在243年也遣使访问我国。后来，孙权派遣康泰、朱应出使当时垄断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强国扶南（约在243—251年间）。孙吴与扶南的友好往来，当然促进了贸易关系。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了当时来我国广州等南方港口的外国商船：“外域人名舩曰舩（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

百人，物出万斛（斛）。”^⑩孙吴时期的广州港，经常停靠着狮子船、天竺船、安息船、波斯船和昆仑船（扶南及属国之贾舶），这些外舶数狮子船最大，昆仑船最多。

孙吴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康泰、朱应之行，影响深远，“其所经传闻则有百数十国。”^⑪为尔后的海外贸易往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东晋南朝时期广州对外贸易日趋繁荣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封建主各据一方，逐鹿中原，北方受害尤为惨烈，东晋南朝虽然政权屡有更迭，但南方兵祸较少，相对稳定。随着商业的发达，广州人口有所增长，城区有所扩大，“晋时，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皆蛮獠杂居。”^⑫这里所指的“蛮獠杂居”中的“不宾服者”，其中就包含了为数众多的，流动性较大的中外商人。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造船业比孙吴时代发达得多，不但政府拥有大量船只，民间也能营造大船，孙吴时最大的海舶装载量不过万斛，而南朝则达二万斛。这些海舶仓底分八槽，某一槽触礁入水，海舶仍无沉没之虞，漏水处可及时修补。^⑬其时尚未发明指南针，以北极星导航，“唯望日月星宿而进。”^⑭船上另设有专门辨认航向的海师，同时又利用信风行驶，如法显从耶婆提（在苏门答腊，一说在爪哇）泛海回国，就是趁从澳洲北部吹来的西北季风，这一切无疑对海外贸易有很大的促进。这时期日南、交趾所治两港已逐渐衰落，广州港更独霸昌盛。

晋的统一虽很短暂，但仍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晋书》云：“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⑮刘宋时期，比较注重经营南方，广州对外贸易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元嘉七年（430年），西南夷罗施国就曾恳请中国让他们的商舶到广州自由贸易。他在给宋文帝的表文中说：“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返），不为禁闭。……愿救广州时遣还。”^⑯梁时，一年之内到达广州的外舶就有十多批。南朝和扶南之间的官营贸易也很密切，《南齐书》记载：“（扶南）晋、宋世通职贡。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阁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释那伽仙附扶南王商船去扶南，被风飘至林邑，财物尽被其夺。扶南王得知后，特遣释那伽仙向齐武帝告状，要求善断此事，表文中说：“臣（即扶南王）前遣使贡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飘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具陈其从中国来此。”^⑰一般认为，僧人往返只是两袖清风，但释那伽仙离广州时带有“私财”，恐怕多少也做点生意。可见当时广州海外贸易之盛况。以上是有关南朝时期广州与海外贸易较详尽的记载。

来到广州停泊的商舶，也有些继续北上，冯承钧先生考据：“南海交通频繁之大港，要不外交广二州。顾外国船舶所莅，且溯江而上至于江陵。”^⑱《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记载“有五艘天竺舶从广州北上至长江，再到达长安。”

广州海外贸易日益繁荣，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当萧励任广州刺史时，“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⑲同时，当地政府所需要取之于海外贸易也成了惯例，“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⑳

东晋南朝时期尚未出现专门管理市舶的机构，又无章可循，这就给贪得无厌的官吏以可乘之机。他们把来这个南方最富庶的城市任职，看作是个不可多得的肥缺，总是拼命囊刮，出任广州

的刺史往往都满载而归,《南齐书》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②官吏的品德,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的兴衰,《南史·萧劭传》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劭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为官侵渔商贾利益,商人则畏而避之,清官萧劭纤毫不犯,商船就接踵而至。

东晋南朝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之日趋繁荣,除了政府较注意发展海外贸易外,当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时兴时衰,使海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四、隋朝时广州海外贸易的大发展起承前启后作用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社会进入繁荣安定,《文献通考·国用考》云:“隋文帝开皇(581—600年)百姓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师,相属于道,昼夜不绝。”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开凿运河,曾使社会经济受到损害,遭到人民强烈的反对。但是,南北船只从此有运河通航,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也为唐以后国内外贸易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隋虽短暂,但还是很注意发展对外贸易。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在京都门外设置四方馆,迎接四方来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专门派遣常骏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宋卡、北大年一带),^③这是继汉使、吴使出访南洋诸国后的又一壮举,这对推动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南洋一带除了赤土外,真腊(柬埔寨)、林邑、婆利(印尼的巴厘岛)、盘盘(在马来半岛北部)和丹丹(在马来半岛中部)等十多个国家都与隋朝友好交往,“蛮夷朝贡者”络绎不绝。隋炀帝于607年冬特地在洛阳举行“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④的游园大会,来自海路、陆路的各国使者、商人欢聚一堂,美丽富饶的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活动对发展海外贸易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七世纪初,隋亡,唐继承和发展了隋朝建立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广州,更成了中外商人云集之地,使其“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⑤广州港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发达时期。

注释:

①—《汉书》卷28下《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类似:“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②③《汉书》卷28下《地理志》“粤地”条。

④ 王士鹤:《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地理集刊》,1959年第2号,第61页。

⑤ 《后汉书》卷116《南蛮·西南夷传》。

⑥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天竺》。

⑦⑧《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

⑨ 《高僧传》初集卷1。

⑩ 《广州汉记》第477页。

⑪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⑫ 引《太平御览》卷769《舟部二》。

⑬ 《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总叙》。

⑭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1《广东·海陵》。(下转26页)

明代广州的海外丝绸贸易

徐俊鸣

郭培忠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政策,封建经济比前代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也有新的趋向。本文就明代广州海外丝绸贸易的情况,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明初,由于防范原来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逃入海岛,勾结日本的“倭寇”,骚扰沿海。同时,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防止农民弃农就商,所以实行所谓“朝贡贸易”,这就是由政府控制一定范围的海外贸易,而不允许私人到海外贸易,所谓“明初定制,片板不准下海”。

洪武初,曾一度设市舶司于太仓(今江苏省太仓县)、黄渡(今上海市属嘉定县吴淞江北岸),但不久即行撤废。其后,又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三处设市舶司^①,但到洪武后期,亦都撤废。

由于明王朝政权日益巩固和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驿,浙江曰安远驿,广东曰怀远驿。”^②从此,宁波、泉州和广州同时复设市舶司并附设招待外宾的驿馆,而在广州所设的怀远驿(位于今广州西关十八甫),房舍有一百二十间之多。

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大航海家郑和曾奉命率领大规模的船队,带着我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七下西洋(指印度洋及南海),经历了三十余国,船队虽没有经过广州,但对广州的海外贸易是有一定促进的。

明朝前期,海外贸易是在政府控制下进行的,明廷对于“朝贡”国家的期限、船只、人数、贡品、勘合(准许证)都有规定。《明会典》记载的朝贡通例有:“凡朝贡方物,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诸蕃国及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者,所贡之物,会同馆呈报到部。主客部官赴馆点检见数,遇有表箋、移附仪部,其方物分豁进贡上位若干,殿下若干,开写奏本,发落人夫管领。先具手本、关领内府勘合,依数填写及开报门单,于次日早朝照进内府;或于奉天门,或奉天殿丹陛;或华盖殿及文华殿前陈设,本部正官奏启进纳。”^③来华国家的贡品,以各类香料为主,此外,还有海珠、宝石等,明廷“赏赐”则以丝织品为主。此外,还有瓷器、金、银、钱钞等。^④据《殊域周咨录》转引《明会典》等的记载: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刺、爪哇、满刺加、彭亨、三佛齐、渤泥等国的使者回还,俱由广东布政司和市舶司迎送、款待。^⑤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国使者昭禄群膺

来访返暹时，明廷馈赠“织金文绮、纱罗、文彩各四匹……从者七人各赐帛一。”^⑥永乐二十年(1422年)“暹罗国王三赖磨刺札的赖使坤思利亦贡方物”，明廷回赠“坤思利亦冠带及钞百锭，红丝、纱罗各四匹……其王三赖波磨刺札的赖锦四匹、红丝、纱罗各十六匹”。^⑦由于丝织品受到外国的欢迎，所以明廷常以丝织品等物馈赠。如明廷对于满刺加使者赠送的礼物做出规定：满刺加的“正副使初到，每人金织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彩缎四匹，表里纱罗各二匹，折纱绢四匹，织金红丝一套，通事初到，每人素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绫三匹、折纱绢六匹，素红丝衣一套，随从初到，每人绢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折纱绢二匹，胖袄鞋各一付。”^⑧贡品越多，赏赐越多。当时，许多国家就是以朝贡关系进行贸易。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矣。”^⑨《筹海图编》也载：“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在广东专为占城、暹罗诸蕃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或云互市之说，即入贡之说也。”^⑩当贡舶进入广州之前，必须先按指定的澳口（临时泊口）停泊，接受明朝官吏的盘验，《广东新语》列举了九个贡舶港口，这就是：新宁县辖下的广海、望峒、奇潭。香山县辖下的浪白、十字门、嫁镜。东莞县辖下的虎头门、屯门、鸡栖。^⑪贡舶载运的货物，可分为两类：一是进上的方物，二是随贡舶而来的货物。蕃货由牙行报官后，须由官方抽分，抽分有两种方法：①抽“本色”，即抽取货物。②折钞，即折合物价而收钱钞。若蕃货中有上好的货物，则由市舶官

收买，称之“博买”（有时也由官方令民博买）。“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蕃，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⑫隆庆年间，因夷商报货不实，改用丈抽，即按船之广狭抽税，称为水饷，由船商负责。此外，还有货物税，由商人纳之，称为陆饷。当时，丝织品是大宗的贸易货，如满刺加使者到广东，每次都有三艘船随同而来，使者进京。满刺加船只先把丝绸、绫罗等物品运回本国，至明年，再来接使者和运载丝织品等货物回国。广州是当时我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港口。据《明会典》记载，经广州领取“勘合”，亦即由广州登陆入京的有十五国，即“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利加（今地待考）、苏禄国东王、西王，苏禄国峒山（苏禄今属菲律宾）、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苏丹国等地）、古里（今印度西岸科泽科德）、古麻喇（今东非肯尼亚之马林迪）、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真腊（今柬埔寨）、柯支（今印度西南岸柯钦）、锡兰山（今斯里兰卡）、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榜格兰（今孟加拉）”。《广东新语》所载又与上述有所不同，现录之以资比较：“诸蕃之直通[来广东者，日婆利（今印尼巴厘岛），日古麻喇，日狼牙修（今泰属马来半岛东岸北大年一带），日占城，日真腊，日爪哇，日暹罗，日满刺加（今马来西亚属马六甲）、日大泥（泰国属北大年）、日蒲甘（今缅甸蒲甘城一带）、日投和（即墮和罗钵底，今泰国南部佛统附近），日加罗希（今地待考），日层檀（即层拔，今东非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海岸一带）、日赤土（今马来半岛北部，包括泰国的宋卡和马来西亚的吉打区一带）。其直通安南（今越南河内附近）者，日林邑（即占城），

曰盘盘（今泰国属马来半岛东岸克拉地峡附近），曰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港附近），曰急兰丹（即马来半岛上马来西亚属吉兰丹），曰顿顺（马来半岛北部近暹罗湾处）。曰州湄（今地待考），曰渤泥，曰阁婆（即爪哇），曰扶南（即真腊，今柬埔寨），曰彭坑（今马来西亚彭坑河口北干），曰毗騫（今地待考），曰

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曰西洋古里（即古里，今印度西南岸的科泽科德），曰榜加刺（孟加拉），曰苏门答刺、曰古里班卒（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 Baros），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⑤现将跟广州有易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购入我国丝绸的列表如下：

国家或地区名	今 名	丝 织 品 名	书 名
暹 罗	泰 国	色绢、色缎	《明会典》、《殊域周咨录》
三 佛 齐	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	五色布绢、色缎	《广东新语》、《殊域周咨录》
占 城	越 南	纁丝、纁绢	《明会典》、《瀛涯胜览》
安 南	同 上	织金文绮、纱罗	《广东新语》、《明史·安南传》
渤 泥	文莱苏丹国	色 缎	《明会典》、《星槎胜览》
苏 禄	今属菲律宾	罗锦、文绮、帛	《明会典》、《明史·苏禄传》
爪 哇	印尼爪哇	绒锦、织金文绮、纱罗	《明会典》、《明史·爪哇》
古 里	印度科泽科德	色 缎	《明会典》、《星槎胜览》
真 腊	柬埔寨	锦缎、丝布	《明会典》、《星槎胜览》
锡 兰 山	斯里兰卡	色缎、色绢	《明会典》、《殊域周咨录》
柯支(柯枝)	印度柯钦	色缎、白丝	《明会典》、《星槎胜览》
苏门答刺	印尼苏门答腊	色 绢	《明会典》、《殊域周咨录》
榜 格 兰 (榜葛刺)	孟 加 拉	缎、绢	《明会典》、《殊域周咨录》
满 刺 加	马来西亚马六甲	色 绢	《广东新语》、《殊域周咨录》
彭坑(彭亨)	马来西亚彭亨	色 缎	《广东新语》、《星槎胜览》
天方(天房)	沙特阿拉伯麦加	缎匹、色绢	《广东新语》、《殊域周咨录》
急 兰 丹	马来西亚吉兰丹	锦绮、纱罗、彩帛	《广东新语》、《明史·急兰丹传》

官方贸易即朝贡贸易给明朝封建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好处，我们从嘉靖中巡抚都御史林富的上疏可以窥见，其疏云：“今以除害为民，并一切之利禁绝之，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之心，则广东之废市舶是也。……旧规，至广番舶，除贡物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

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以充羨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则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此其利之大者三也。货物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直〔值〕，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